



引用格式:杨子江,柏昌利.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以中国《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97-103.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97-07

#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

——以中国《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为例

**The comparison of recent educational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king China's *Kuimao educational system* and Japan's *Educational system* for example

杨子江, 柏昌利

YANG Zi-jiang, BAI Chang-li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学制是一个国家教育体制的核心,是各国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中日两国近代学制在推行和发展中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日本的教育改革和学制制定有更明确的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富国强兵、普及义务教育;相较之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则略显被动。从中国的《癸卯学制》与日本《学制》两部著述来看,中国学制的指导思想虽较为笼统,但也改变了单一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奠定了现代学制公平性的基础;日本学制的指导思想带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中日两国近代学制对两国近代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关键词:**

近代学制;  
近代教育;  
中日比较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杨子江(1991—),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柏昌利(1960—),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所谓学制,简单来说,就是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是实施教育的组织体系。18世纪中后期,西方近代化浪潮的涌入,使中日传统教育思想和旧式教育体制均遭受巨大冲击,为满足国家近代化对于教育的要求,两国分别出台了新学制作作为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指挥棒”,以此推动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在中日近代学制的比较研究中,学者大多关注其历史背景和对近代教育的作用,没有深入探究学制实施成败的内在原因。本文认为,学制能否顺利推行直接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同时与学制内容本身是否合理密切相关。由于中日近代学制在预期目标、内容和实施环境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 一、中日近代学制产生背景比较

### 1. 中国近代学制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清朝末期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给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很大影响,新的教育思想启发了许多有识之士,近代学堂的产生,以及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凸显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

首先,清末留洋官员的积极进言,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出台提供了重要思想准备。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收录的文献可以看出,自1866年起,从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中国官员斌椿写下的《职方外记》,到王之春的《广学校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学制》等,无不深受西方和日本诸国完善的教育制度的影响和感染。张謇在他的《变法评议》中写道:“东西各国,学校如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为中国今日计,不独当师其改定之法,亦当深知其初定之

意。”<sup>[1]</sup>罗振玉的《学制私议》详细论述了教育宗旨、教育阶段、每日授课时数、教员、考试,以及残障人士如何受教等十二条制度。这些表明,最先接触到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官员提出了教育近代化的诉求和实施方案,为中国近代学制诞生做了良好铺垫。

其次,新式学堂大量增加并迅猛发展,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末年,中国各类学堂数量迅速增长,其中包括西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水师、武备学堂等多个种类。截至1902年,学堂的学生数量已达8912人。<sup>[2]</sup>其中,于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已经有了初步的中学与大学之分,而南洋公学已经有了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以及师范学校等专科学校之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令“除京师已设之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sup>[3]</sup>。规模和数量日俱增加的学堂需要统一的管理办法,愈发凸显设立新学制的必要性。

最后,科举制度脱离现实的弊病愈加凸显,成为近代学制确立并实施的重要现实原因。清末时期国家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社会现实,与西方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巨大反差。清末时期的科举,科场风气不正,考试内容严重偏离社会发展需要,人才选拔制度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当一种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时,必然要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

### 2. 日本近代学制产生的背景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其成果之一就是日本近代学制的产生。19世纪中期,日本掀起了明治维新运动,确立了国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富国强兵”,明治政府非

常注重对西方教育文化的学习和引进,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聘用外国专家和技师并派遣留学生,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制定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学校制度,明治三年(1870年)出台的《大学规则》正式确立大中小学学校体系,同时开始着手民众教育。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日本近代学制的产生,而且为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推动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旧式教育体制不能满足新的人才需要,是加速新学制出台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长期以来,日本都是沿袭德川幕府时期的教育制度,本质上是以贵族教育为主。大多数教育机构,如“藩校”、“乡校”(针对商人和地主)、“寺子屋”(针对平民)等,严格说来均不是符合教育体制规范的学校,也不符合维新运动所倡导的新式人才教育观,因而创建新式教育制度变得迫在眉睫。明治二年(1869年),地区政府依据教育改革方案,开始设置初等、中等学校,并对旧式学校进行改造;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文部省,负责推进国民教育改革;1871年,文部省成立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新学制的编制。至此,日本完成了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学制的产生背景,可以看出,其相同之处在于,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旧的教育体制均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改革并制定新的教育体制;其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教育改革和学制制定有更明确的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富国强兵、普及义务教育。另外,此前日本的教育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果,为其近代学制的产生打下了根基。相较之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则显得非常被动。

## 二、中日近代学制内容比较

1902年,《壬寅学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

有了统一的近代学制。两年后又推出的《癸卯学制》,是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结合湖北实际,将《壬寅学制》加以改良后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推行的新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学制正式确立的标志,该学制一直沿用到1922年,之后由中华民国的《壬戌学制》取而代之。1872年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出台了第一个《学制》,这是第一个面向全国而制定的综合性现代教育制度,一直沿用至1879年,由《教育令》取代。总的说来,中日近代学制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 1. 指导思想方面的差异

清末《癸卯学制》确立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宗旨,在《学务纲要》中分别对各级学堂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培养儿童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培养学生的谋生能力,使其掌握必备知识,为其毕业后谋生打好基础;高等学堂(大学堂)的学生主要学习国政民事,使其成为未来国家治理的储备人才。此外,对通儒院、实业学堂、译学馆、进士馆、师范学堂等都制定了基本办学宗旨。总体来看,各学堂职责分明、分工明确,对于各级学堂毕业生所应达到的基本能力要求较为实际。此外,《癸卯学制》体现出张之洞一贯的“中体西用”思想,学生学习依旧以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学务纲要》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在各级学堂章程中还明确规定了学习经史的课时和课程内容,同时明确将学生品行的考核作为考试通过的必要条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的学制指导方针。

日本《学制》的指导思想带有强列的反封建的时代意蕴。首先,它否定了封建教育理念,

坚持教育是个人的立身、治产、昌业之本的近代教育观,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它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全民教育理念;最后,它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主张围绕“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办教育,强调以个人实业厚生为目的做学问。此外,在学制制定中,日本很大程度上也整合了西方多国学制的精髓,将自身学制打造成为多元化的复合制度,这也体现出日本在每一个领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的民族心理<sup>[4]</sup>。

相比而言,中国学制的指导思想较为笼统,没有摆脱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子,依然以传统儒学教育为主,突出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此外,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日本以学习西方制度为主,教育改革从观念入手,因此比较彻底;中国以培养技艺人才为主,教育改革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也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 2. 文本方面的差异

中国的《癸卯学制》以《学务纲要》为总纲,共计22个章程,对各级学堂的招生对象、开设课程、入学条件、考试与毕业等都作了详尽规定。日本《学制》的内容由学区、学校、教师、学生和考试、海外留学生规则和学费六部分组成,共109章。作为《学制》的补充,1873年日本发布了《学制二编》《学制追加》和《学制二编追加》,增添了关于海外留学生规则、神官僧侣学校相关规定、学科毕业证书规定、专门学校、外语学校等,共计213章。为更直观地比较中日近代学制在内容上的异同,笔者将两种学制中关于学区、学校设置、升学、考试、费用、教员、课程设置等内容列于表1予以说明。表1表明,我国的《癸卯学制》更加详尽实际和人性化,可实施性更高,各地区学堂的建设和推行有一定的自由度;而日本《学制》的规定更完备,尤其

在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与特殊人群的教育上考虑非常细致。从当时的国情来说,日本学制有些理想化,没有考虑各地区的实情;但从长远角度来说,它是符合国家近代化发展需求的,更能促进教育持续长久发展。

## 三、中日近代学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教育影响比较

### 1. 《癸卯学制》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影响

《癸卯学制》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体系的基本确立。《癸卯学制》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具体影响是:其一,改变了单一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重视发展普及教育和师范教育。由洋务运动开始的西学,只针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而没有考虑从根基着手以改变国民教育落后的现实。中国近代学制的颁布,细化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宗旨,大力推进了师范和实业教育体系和专门学堂的发展,使教育普及有了明确方向。其二,新学制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封建教育制度的最终解体。在《癸卯学制》颁布初期,科举制并未迅速废止。新学制规定的学堂学习时间较长、规章制度繁多,而科举制度虽然由于官员上书逐年分科递减,但仍是步入利禄之途的捷径。在此情况下,选士大多仍抱侥幸心理,舍远求近、舍难求易。由此造成学堂招生困难,即使入学条件宽厚,举荐的学生也不愿意入学堂。这种社会风气导致学堂有名无实,新学制的推行严重受阻。因此,袁世凯、赵尔翼、张之洞等上书,建议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由此得以废除,全国统一执行新学制。其三,《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学制单轨制传统,奠定了现代学制公平性的基础。所谓单轨制就是不分阶级和社会地位,所有的学生用一套教育体系培养,没有特殊区分,这一性质延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其四,《癸卯

表1 《癸卯学制》《学制》学制内容比较<sup>[2]300-337,494-521[5]</sup>

名目	中国《癸卯学制》	日本《学制》
学区	按省划分,不限学堂数量	全国分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大学1所,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小学1所,共计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
学校设置	初等教育阶段: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 中等教育阶段:中学堂(5年); 高等教育阶段: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3~4年)、通儒院(5年); 另设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四者皆属高等教育性质)	小学:分上下两等,6~9岁为下等,10~13岁为上等,共8年。类别分为寻常小学,幼稚小学,私塾小学,贫民小学,村落小学,女儿小学和残疾人小学; 中学:分为上下两级,共6年。除普通中学外,还设立商业学校、通弁(翻译)学校、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诸民学校(在职人员业余教育)、残疾人学校; 大学:分大学和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类似职业学院,例如矿山学校、法学校、医学校、艺术学校等
升学	高等小学毕业学生给凭归地方官考试核办,升入中学堂;中学堂毕业学生给凭归道府大员考试核办,升入高等学堂;高等学堂毕业学生的考试由简放主要负责,督抚学政辅佐;大学堂毕业学生由简放总裁和学务大臣共同组织考试	规定儿童适龄必须入小学,能否升学由升学考试成绩决定
考试	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外场分数(按学习程度、课程内容分类出题)、内场分数(文学考试)和品行分数,品行分数必须合格,然后依照另行章程,依据出身不同,分别录用	分为小考(升级考试)和大考(毕业考试),小学和中学在毕业时要进行大考,合格者授予毕业证书,对优等生有奖励制度,大学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费用	除初等小学堂和优级、初级师范学堂不收学费外,其余学堂均收学费,其中伙食费、住宿费、书籍衣服费用等需学生自己承担;学费收缴的多少各省依据筹款情况自定,但要求费用适度,学生力所能及	由三部分组成:学生缴纳的学费;民间捐赠款、学区内筹集和诸项存款利息;国库补助的委托款。对于家庭贫困、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贷款交学费
教员	学堂的教员列作职官,方便管理并规定年限;国籍不限,中外教师皆可,但外国教员不得讲授宗教知识	小学教员年龄在20岁以上,性别不限,要求获得师范学校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证书;中学教员年龄在25岁以上并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大学教员须获得学士称号
课程设置	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图画、手工酌情开设;高等小学堂除上述8门外加中国历史1门,农业、商业酌情开设; 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体操、法治理财(酌情选择)12门; 高等学堂:分为经学科、格致科和医科3类,每类有不同基础学科,此外依据学生兴趣开设不同方向的课程; 大学堂:分8类,经学科(含理学)、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每科分不同门,每门开设不同课程,学制中有详细介绍	小学:分三等科,初等、中等、高等内容逐渐增多,高等科目为修身、读书、习字、绘画、体操、地理、博物、物理、裁缝、化学、经济、生理、几何等; 中学:下等中学学习国语学、数学、习字、地学、史学、外语学、理学、画学、古言学、几何学、记簿法、化学、修身学、测量学、奏乐,上等中学增加动植物学、地质矿物学、经济学、重学; 大学:理学、法学、化学、医学、数学,后加文科、法科、医科等学科; 在追加条文中又对专门学校(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矿山学校、兽医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进行详细规定
学生	不设女学,录取时有保人限制	不分性别和出身,专设女子学校

注:\* 简放,清代指经纶叙派任的道府以上外官;\*\* 总裁,清代指中央编纂机构的主管官员和主持会试的大臣。

学制》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和方法,将西方教育思想融入了教育教学和课程设制中。例如,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提到,教授儿童要循循善诱,不应体罚伤害学生,让学生犯错后有羞耻之感即可,对于记忆力差的学生可让其用自己的话讲解文章,不宜强制背诵经文等。这些规定说明:我国学制已将西方儿童心理学思想融入教师的教育教学中。

《癸卯学制》出台之时,日本《学制》已出台实施32年。我国虽然也注重学习其学制,但没有看到日本近代教育观念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癸卯学制》在制定实施中依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将教育改革只是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此外,在社会环境动荡和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中,百姓也无心学习。这使得学制在推行过程中阻碍重重,流于形式的弊病较为严重。有日本学者曾评论中国在推行学制中的现状:“各省督抚铺排门面,上下相蒙,常怀观望,依违不决,即有末一二学堂,亦不过具文,有兴学之名,无教育之实……财政无统一之制,官吏后公益而先私利,欲兴学堂,无款可筹拨……巨室富人,甘为守钱奴,宁投财于游冶祷祀,而不用之于教育……人民风气感情不一,或有讼言革命变法,自由平等,不受约束,政府辄当罪新学,晋绅章甫惧祸及己,不敢提倡新学。”<sup>[7]</sup>此评论真切地道出了清末学制在贯彻实施中的实情。

## 2. 《学制》对日本近代化教育的影响

日本《学制》在其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把教育的普及和国家的生存、富强、发展与国民的修身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施促使其国民基本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其一,学制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把教育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很深刻、很有远见的认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其作用虽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前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

入,但对国家未来发展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新的教育观影响了近现代日本的发展,对于学校性质的规定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生活。其二,《学制》的实施极大促进了日本初等教育的普及,为之后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县级政府把平均财政的40%以上用于初等教育,并且为小学提供最好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日本的学校数量、教员数量和学生数量迅速增长。明治六年至明治十二年,日本的小学数量由12558所发展到28025所,儿童上学人数从110万增加至230万,教员从2.5万增至7.1万,就学率从28%增加至41%。其三,《学制》在思想上逐步塑造并培育了国民意志,使人们主动参与日本经济建设,由此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提出:“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但是,《学制》在日本的推行也引发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学费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另外,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也使得教育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教育改革中的实用与功利主义心态,导致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出现与自身改造的不适应性。此外,学制内容也不尽合理,从效果看,高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

##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近代学制的制定和实施加速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步伐。中日两国当时都处在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时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推进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并且都以制定和实施新学制为教育改革的标志。学制是教育制度的核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同时也深刻地印上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对比中日两国学制的差异和

两国后来的发展实际不难看出,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教育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同时也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变革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教育的发展根本上还是依赖于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进步。

### 参考文献:

- [1]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0.
- [2] 王笛. 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J]. 史学月

刊,1986(02):110.

- [3] 璩鑫圭. 学制演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4] 马立民. 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及其特点研究[J]. 中外教育研究,2011(12):67.
- [5] 石艳春. 日本明治初期的《学制》[J]. 学术论坛,2010(06):180.
- [6] 杨晓. 癸卯学制与近代日本须知的比较[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06):23.

(上接第64页)

- [5] 贾立政. 感受美国期刊数字化转型[J]. 新闻战线,2014(3):27.
- [6] 文之强. 以新媒体为核心建立三次售卖模型[J]. 中国报业,2014(4):14
- [7] 向飒. 媒介融合下的期刊数字化发展生存之道[J]. 传媒,2012(8):30.
- [8] 周小玲. 学术期刊如何实现微信传播?[J].

社会观察,2014(10):12.

- [9] 向飒. 论媒介融合下期刊品牌影响力的网络传播策略[J]. 出版广角,2012(8):70.
- [10] 雷永青. 从“读者”到“用户”——探讨传统纸媒转型的盈利模式[J]. 新闻与写作,2014(2):32.
- [11] 王磊,赵文义. 学术期刊的品牌与盈利模式分析[J]. 编辑之友,2012(2):18.